

历代贡举志一卷

明秀水冯梦禎开之著

贡举之有科目，盖未之前闻也。虽周曰三物，曰四术，曰九年大成，试之似有定涂；曰选士，曰俊士，曰造士，曰进士，取之似有定序；曰论定，曰任官，曰位定，用之似有定制。大都极其详慎若此。而宾兴，而拜受，又极其隆重若此。初未以一定科目，薄试于始，厚任于终，贱视于先，尊显于后，若今兹也。

秦称虜用其士，而仕进之涂，辟田胜敌之外，无多寄径焉。

汉初，诏贤士大夫，既与我定有天下，而不与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郡守身自劝遣，嗣是诏孝悌复一身，置官二千石。建元初，诏天下举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。以董仲舒请，令郡国岁举孝廉，限以四科：一曰德行高妙、志节清白，二曰学通行修、经中博士，三曰明习法令、足以决疑、能按章覆、文中御史，四曰刚毅多略、遭事不惑、明足决断、材任三辅县令。元光五年，徵吏人有明当世之务、习先圣之术者，县次给食，令与计偕。元朔初，天下谨法，莫敢谬举，而贡士盖鲜。故又诏中二千石及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，郡国乃于属僚部人之贤，举为秀才廉吏，贡于王庭，多拜为郎，居三署，无常员，而公车徵起者悉在焉。元封五年，诏州县察吏人有茂材异等，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。元朔[1]五年，诏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常与计偕。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，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始元初，遣王平辈持节郡国，举贤良。本始后，王吉请明选求贤，除任子弟之令。永光初，诏丞相御史，举质朴重厚、退逊有行者。光禄岁，以此科第郎从官。

王莽时，太常岁课，甲科为郎中，乙科为太子舍人，丙科为文学掌故。

后汉建武间，诏举茂才廉吏，三公而下，其数有差，于时进用，加以岁月先后之次，且卒焉持[2]拜，不复简试。故谤议纷起，良以士多矫饰也。建初初，复用故事，以四科辟士。永建后，又增甲乙科。左雄议改察举之制，胡广辈不能驳其议，张衡辈不能复其试。得[3]黄琼为尚书令，乃以雄所上孝廉之选，专用儒学文吏。于取士之术，犹有所遗，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。建和、永寿间，试用诸生，大率以占第上下，通经多寡，限以三互，自生留阂。建宁间，试甲乙科，争第高下，中有贿赂，改兰台漆书之经，以合其私文者。则诏诸儒讎定五经，蔡邕篆隶镌石于太学，谓之石经，有以也。科目昉于汉者若此。然士之出，犹多以乡人劝勉，而耻急于自进焉。

汉以降，魏虽有除限年之制，令郡国贡举，勿拘老幼，儒通经术，吏达文法，则皆试用。古虽有除九品之请，复古乡举里选之法，祛今八损三难之弊。萧齐取盈于五通，元魏求多于三清。卒之增年矫貌，扳援奔竞，浸浸成风，不

可遏抑。良以贡举者循名遗实，而应举者务华绝根也。

隋初，以志行修谨、清平干济之科举人。至炀帝，好文词，始置进士科，专诗赋取士，不复阅行能。贡举之弊，弊无以复矣。

唐仍隋，上郡岁举三人，中郡二人，下郡一人，有才能者无常数。其由学馆贡者曰生徒，由州县举者曰乡贡，皆升于考功而进退之。其科之目，曰秀才，曰明经，曰进士，曰明德，曰书，曰算，各依所习业，举选以为常。其天子自策举之，曰制举，以待非常之士。诸乡贡怀牒自列于州县，试已，取文优者，长吏以乡饮酒礼，会属僚，陈俎豆，备管弦，牲用少牢，歌鹿鸣之诗，与耆艾叙长幼，宾兴焉。于是疏名列结，通保上户部。户部集阅而阅考功，考功员外郎试其贡举校试之失者，皆有罚。初，秀才科最高试策五条，有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，凡四等，后废。而进士科特重，然专之文辞。他制科名，如道侔伊吕、才膺管乐、志烈秋霜、文经邦国、辞标文苑、临难不顾、徇节宁邦、长才广度、沈迹下僚、乐道安贫，及贤良方正、博学宏辞等科，免丝燕麦，徒拥空名而已。

贞观间，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。调露间，奏加帖经，兼通《老子》、《孝经》。永隆间，诏试文两篇，识文律，然后试策。载初初，以策问贡人，数日方了，改试殿前，自此始。长寿间，令举人献岁元会，列于方物前，以备充庭，又制臣轨两篇，贡举习业，停《老子》。神龙间，贡举人仍习《老子》，停臣轨。

开元间，司业李元瓘言，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及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诸经，并圣贤微旨，生人教业。《周礼》，经邦之轨则；《仪礼》，庄敬之楷模；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历代崇习。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，四经殆绝，请令学生量配作业，贡人参试。又新注《老子》成，诏贡士减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策，而加《老子》。会考功员外郎不称，为士所诋诃，朝议以郎官地轻，移知贡举于礼部侍郎。礼部选士，自此始。

天宝中，帝欲尽官天下材，命通一艺以上咸诣京师，策之。相李林甫专恣，患草野士倨侮，得斥言其奸，请令尚书省先试，无一人及第者，而林甫以野无遗贤表贺。时中丞倚得幸帝，侍郎宋遥、苗晋卿欲附之，以倚子奭为举首，群议沸腾。帝召面试，奭手试卷，终日不成一字。遥、晋卿坐贬官。其后有司钩校，争苛切为公。水炭、脂炬、饗飧，皆士人自将。罗棘遮截，始唱名入列，坐庑下，士益浮贱。

礼部侍郎杨绾患之，上贡举议。大都以举人幼而就学，止诵当代之诗；长而博文，不过诸家之集。遽相党与，用宏虚声，六经二史，皆同挂壁，投刺干谒，驰骛要津。无论孔门君子之儒，非所仿佛；即汉之贤良方正，必不出此。

请依古侧席之求，罢今将牒之举。县令察孝廉，审举其有孝弟忠信礼仪之行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，以孝廉为名，荐之州。州刺史礼侍之，试其所通之经学，通者上第，上之省，皆毋得辄自陈牒。其所习经，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，任科一经。务取深义奥旨、通诸家之学者，至京，遣诸司官有儒学者主试。每经问义十条，已，对策，策三问，问古之治体及时务所施行者。全通为上第，付吏部授官；经通八、策通二，为中第，与出身；下第罢归。诸明经帖括非古制，请与进士并停。其国子、举人类此。左丞贾至议，大都以晋后衣冠迁徙，人多侨寓，于所在占籍，必举之乡，不足以尽材。请增国子博士员，十道及诸大州各设学，致生徒。其在桑梓者，乡里举之；在流寓者，庠序推焉。然终未俞行。丞相郑覃请罢进士之科，李德裕稍杀进士之礼。盖唐末进士科浮薄滋甚，诚如舒元舆言，进士科，公卿大夫皆由此涂出，今有司坐举子于寒庠冷地，比仆隶已下，非所以徵贤之意也；施棘围以截遮，是疑之以贼奸徒党，非所以示忠直之节也；试甲赋律诗，是待之以雕虫小技，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之道也。恐贤人君子远去，不肯污辱为国家用矣。贡举委地，弊且不可收拾也。

宋初，一时风气椎朴，人不知学问，不愿仕宦。太祖置贤良，若经学，若吏理，凡三科，不限资，而郡县无应令者。又许诣阙自荐，对制策，不称。又诏察孝弟力田，若奇异，若文武，可任使者，具送阙召试，无可采。乃而后复重科举，科制大都同唐，而进士科亦特重。又定渚[4]州贡举条法及殿最之式。而川蜀所贡士，令县次往还续食，以示优。开宝初，进士及第中有学士穀子邴，命中书覆卷试，且诏自今关食禄之家得举者，悉以闻中书覆试。其后学士昉知贡举，黜武济川者，以召问语失次，且知为昉乡人也。昉亦以亲试诸进士落第者数十人坐黜。始定进士廷试，本于唐载初之改殿试也。

太宗时，天下稍习文，帝欲大兴文治，每谓侍臣曰：“朕欲博求俊彦于制科，非敢望拔十得五，但得一二焉，可矣。”首设科，张齐贤在试中，顾不得第。于是并吕蒙正以下，并赐及第，赐宴袍笏，赐《礼记·儒行》篇，命各以优等授官，而进士恩礼之重，不可上也。其后举多覆试。哀[5]十举以上者，特赐出身，曰特奏名。八年，始分甲，赐宴琼林苑。雍熙二年，诏今有以文学往复与吏为奸者，寘之于法；以经义相教者，元出科场。又御试得梁颙等，并唱名及第。淳化三年，知贡举苏易简始命糊名。

真宗二年，以温仲舒言，封印卷首，仍当日入院。又定廷试考第为五等，上二等曰及第，三等曰出身，四五等曰同进士出身。八年，始禁秉烛，并制誊录院易书。天禧间，举人郭匡总麻丧，殿三举，同保殿一举。祥符间，以贡院举人解衣阅视，虑挟藏书册，谓失士体，欲止之，而挟书扶出者最多，得不

为禁乎？

仁宗时，天下承平，进士额广，士鹜浮文。仲淹条议，举人皆舍大方而趋小道，虽济济盈庭，而才识学行之士十无一二。请立州郡学，举通经有道之士，专教授，俾务于兴行明理，使人不溺于华藻。又请外郡科解，必履行无玷、艺业及等者，方许解荐，更不弥封试卷。其南省考试之人，已经本乡询考，方用弥封。于时所禁有七，而假户、冒名，其二也。宋祁上议，诏州县立学，须在学三百日，乃听预乡试。试三场，先策，次论，次诗赋，通考为去取，而罢墨义。张方平知贡举，又上言，设科选士以文辞者，诚谓其怀道义于中而英华外溢，叩其外而中之所蕴可质也。言而不度，将何观焉？迩文格日失，其荐各出新意以相胜，朝廷屡下书戒敕，而学者罕能自还。今赋或八百字，论或千馀字，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，驱扇浮薄，用亏雅俗，非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。学士修知贡举，亦大以为患也。请宽期日试士，试先策，择其芜鄙不通者罢去，留者就试，已，乃定其去留。其后御迩英，讲《周礼》三年大比州里赞乡大夫废兴，喟然曰：古选士如是，今率四五岁一下诏，士有抑而不得进者。令间岁一贡举，进士诸科减解额之半，增明经科。已复制科，如贤能方正、能正言极谏科，博通坟典、明与教化科，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科，详明吏理、可使从政科，识洞韬略、运筹帷幄科，军谋宏远、材任边寄科，又置高蹈邱园、沈沦草泽、茂材异等科，以待布衣之被举者。

治平中，议者以间岁岁贡士，法不便，使士奔走道路无休息，而不得游意于学。诏三岁一贡举，定天下解额，取未行间岁法前四之三为率，明经诸科毋过贡士之数。

神宗初，王安石柄国，益厌唐诗赋取士之陋，欲一之于经术，乃言：欲一道德，在修学校，欲修学校，在审贡举，而贡举之法不可以不变。今议进士科多得士，非其科法善也，士外此无繇进故，其中岂容无正直之贤士。少壮时，正当讲求天下之义理以经世，乃闭门学作诗赋，靡日月于空言。及其入官，于世务了无谙解，此科法败坏，人才致不如古也。于是罢明经诸科，而进士科罢诗赋，各占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兼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每试四场，初大经，次兼经大义十道，次论一首，次策三道，礼部试增二道，中书撰义式颁行，为经义取士之始，视诗赋稍近实主义。而举士不于乡，不先于制行，士终禄利为心，莫能反其本也。

哲宗初，司马光柄国，慨然欲尽官天下之材，乃请自今设十科以举士。已又言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，复先王令典，但王安石不当以其一家私学，尽废前闻而辄之，乃立经义、诗赋两科进士，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内，听习一经。初试经，次试赋试诗，次论策，末

试子史时务。凡专经进士，须兼习两经，以四场通科其高下。又请升朝官岁各荐州郡经明行修士一人以闻，其预荐者不试州郡。礼部试不第，准特奏名，得廷试出身。其登第者，得升甲。风天下以敦士行，不专于文辞。正言刘安世又以祖宗重馆阁，不轻授举进士高第。及大臣荐举，乃储之禁密右地，博之古今典籍，优其廩饩，而不责之吏事，所以滋长德器，育成其辅弼之具也。望明诏执政，详求文学行谊可长育者，召试以充，毋滥及非人。知贡举苏轼、孔文仲以特奏名命官者，垂老无他望，布列州县，惟务黠货，无一思自奋而有闻于时者，愿更加考选，仍限名额，毋使积弊。皆从之。

于时积一治[6]，而绍圣、崇宁尽焚毁以快忿。而其时达官贵胄多得第，上书献赋颂者又得第，阉梁师成用事，隶其家为使臣为小吏者，毕赐第，芜滥至甚。初，祥符张士逊请主司亲戚在进士中，明当引试，愿出避嫌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，移试别头。景祐贾昌朝请随侍远地，宜令运司类试，乃诏诸路有别头试。

咸平中，取士甚多。祥符中，取士甚少。嘉祐间，进士殿试不落一人。治平间，进士分四等，定三岁一举贡举。畴不谓曲尽其制，而不知弊至于宋，洵滔天而不可涯测矣。大抵自汉至隋，惟孝廉、秀才之科。自隋唐至宋，惟进士、明经之科。熙宁后，安石以经义试进士，则明经科废而进士科独行矣。进士轻于唐，重于宋，故今时称宋进士为将相科，有以也。□不知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，则上所程者惟词章，下所习者亦惟口耳。古选贤与能之声，无复存焉者矣。间有张九龄之刚直，吸嘘云雨，颜真卿之忠义，对越神明，陆贽之论谏，裴度之明哲，苏易简、王禹偁之知名，李沆、王曾之雅望，寇准之峭直，张咏之干济，蔡齐之威仪，韩琦、杨寘、范镇之著节立身，固皆不愧科名，然韩愈名儒，何蕃义士，程颐理学，石延年豪举，谓盖代名流不第者又不胜数。洵科主程词，本同射覆，贤不肖亦惟所中也。彼举科场条贯投地而不取者，不有以哉！

我高皇帝设科，广求天下之贤，应文举者，察言行观德，考经术观业，试书算观能，策经史时务观干济。洪武元年，下求贤诏。三年，下开科诏。六年，诏科举取士。终浮文，罢不设。十七年，设科举法，命礼部颁科举新式行焉。已诏各布政司府州县官，举秀才人材，盖科荐并行也。十九年，诏郡国经明行修之士，轮旌束帛，交驰于四方。初定金陵，辟儒士范祖干、叶仪，既至，访道，祖干手《大学》以进，曰具不出此书。克婺州，置行中书省，召儒士许元、胡翰等日会食，其中轮二人讲经史治道。克处州，以书币徵宿儒宋濂、刘基、章溢、叶深以来，命有司创礼贤馆处焉。晚徵耆儒崇德鲍恂、上海全思诚、安吉余詮、高邮张长年，命坐顾问，命为文华殿大学士，恂等固辞，乃赐

敕礼遣之。时孝廉人材及郡县所贡士皆得见，见称旨，即擢不次。而国子生奉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，问民所疾苦，还称旨，即擢用为行省参政、佥事、知府等官，至有擢佥都御史者。已制科举，诸民[7]经、宏词等科并革，存进士科举，与荐举、岁贡为三途，以并用，三年大比而宾兴之。其会试中式士，天子御正朝，制策策焉。又明日，上具皮弁服，御正朝，文武群臣具朝服班侍庐传，赐进士及第、出身、同进士出身，各有差。事讫，群臣前拜贺，辞曰“天开文运，贤俊登庸”，即六卿宣宣[8]制，无是也，故进士科特重。其会试不中式者，送国子监肄业，俟又举。

文皇帝言，国惟求贤，以资治理，宵旰遑遑，急于饥渴。其令内外诸司，于群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沈滞下僚，堪剧烦而优游散地，抱道怀才而隐田野者，各举所知，以名闻，毋媚嫉，毋蔽贤，毋徇私监[9]举。

昭皇帝首申重举官之令，谓天下之广，岂无皋、夔、颜、曾之徒，诚得一人，可胜千百，宜悉心访之。已命国子生有学行者十六人，俾翰林严试，拔其尤，试六科，寻擢为给事中。郑府审理俞建辅言，通宾兴率驰骛于空文，真才鲜少，有年未弱冠，即登第入官，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。令诸有司先审访博古通今、行止端重、年二十五而上者，方许入试。比试，则务选其典雅切实者进之，会试益加重慎。大学士杨士奇言，北人文学远不逮南人，然自古国家兼用南北士，请自今卷首书南北二字，如一科百人，南取其六，北取其四，则南北士皆登用矣。议定而上宾。宣德初，乃奏行著令。

章皇帝践祚，下求贤诏，出御制《漪兰操》、《招隐诗》，赐大臣以《风》。大臣奏举贤能官者，上为降辞色慰藉。廷臣选悞无举荐，降敕责。而司府州县官亦各得举贤良方正一人，上之部。已合临御来三科进士试文华殿，拔其尤，授修撰、编修、评事等官，进学文渊阁，优待之。

睿皇帝复辟，诏处士中有学贯天人、才堪经济、隐居尚志、不求闻达者，具以闻。

肃皇帝入承大统，首言祖宗朝虽定科举、岁贡之法，而荐举尤重，以并列于三途。自科举法行，进士偏重，举人无九卿之望，岁贡限方面之升，田野绝保举之路，以致人尚浮辞，不修实行，宜真才之不可见也。务复科举、岁贡、辟荐之旧，敕进士科文体毋浮冗，必古雅精确，制策往往亲制。知人哲于放勋，吁俊勤于神禹，收揽人才，不啻拔十得五。

其初政粹乎无议矣，后或倦勤，故崔铤有覆举议曰：昔成周之世，联之以比闾族党，教之以德行道艺，正之司徒，升之司寇，六德为本，六行为辅，六艺为翼，无奇袤岐其心。蕞尔之国，必有贤哲，教之效也。国家造士，专用经术，业易能，不假深造，仕易得，不俟大成，故士业经求仕，鲜以裨身。旧法

，里老保其行，试而升之学，再保其行，试而升之省，是犹里选之遗也，而久弃为具文。是上凭科举，曰付至公，故试而得士，若博之中呼，其取之失人，若突[10]之遭负。何则？非有参验之详观考之素可赖也。督学使者，数岁一至，事烦日寡，无裕于施教，故士以益荒。宜岁令县令察举民年十五以上，能通四书及占一经，性行淳谨者，上之守而登之学。其轻狡者，虽才不右，督学官考校黜升之法，必本之性行，责之大[11]守，审验当否，而惩奖施焉。间有幸举者，不延矣。陈建又言，项安世云，举天下之才而一之于科目，入是科者，虽饕餮、桀杌必用，出是科者，虽周公、孔子必弃，宜朱子以为教愈详，取弥精，澄汰再三，而其具不越乎无用之空言，愈弊无益也。夫致治以贤才为本，求才以兴廉察孝为先。经曰：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。传曰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。此务本论也。李克曰：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此察廉方也。苏轼顾諝之曰：上取孝，则勇者割股，怯者庐墓；上察廉，则敝车羸马，恶衣菲食。苟可以中上者，无不用。夫上贤好德，人之秉懿，上好下甚，王治之大几也。上诚敦笃尚行，为天下先，而执此之政，如金石四时，坚久不易，则天下之士争相刮磨。举人者，求无负于知人；举于人者，求无负于所举。纵其有好名徇私之流，殆其鲜矣。况好名而矫于善，不犹愈于[12]好名而肆于恶耶？且天下固未有无弊之法也。然荐举之取士也，择而后用，其失也一二；科举之取士也，用而后择，其失也八九。谓宜特设孝廉一科，取行著乡闾，学通经史，博访严试，优遇隆礼，并居词科之上，庶乎人笃自修，而国有真才之用也。嗟乎！议者不乏，行者最尠，贡举弊于今，殆甚于委地而滔天者矣，曷不率由旧章哉！

[1] 元朔当在元封之前。

[2]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“特”。

[3]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：“得”疑“后”之讹。

[4]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“诸”，当是。

[5]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“衰”，当是。

[6]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：句疑有脱误。

[7]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：“民”疑“明”之讹。

[8]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：下“宣”字疑衍。

[9] 按“监”疑“滥”之讹。

[10]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“弈”，当是。

[11]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“太”，当是。

[12] 疑脱一“不”字。